

王元化 主编

海外
汉学
丛书

【日】小野四平 著

● 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外汉学丛书

主 编 王元化
丛书常务编辑 高克勤
本书责任编辑 竺少华
丛书封面设计 任 意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日]小野四平 著

施小炜 邵毅平 吴天锡 张 兵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5-2250-4
I·1143 定价 14.40 元

序

小野四平先生的《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的中译本即将出版，欣喜之余，不胜感慨。

我与小野先生见面，是1979年10月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举行的中国学会年会上。承他盛情，把这部大著送了我一册。所以，这是我最早读到的日本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撰的汉学研究著作之一。因为在这以前，我虽读过一些日本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但原著都出版于战前；直到那一年的10月，应邀在日本神户大学任教，才读到了该国学者自战后至七十年代的不少论著，并且很受启发。同时，也使我更深切地理解了“左”的干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严重破坏（当然，对其他领域也一样）。

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根本的原因，是引进了新的观点和方法，从而使传统方法中的具有科学成分的部分——主要是乾嘉朴学——也进一步发出了光彩。倘非如此，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不可能出现。然而，由于“左”的干扰，这种进展的势头自五十年代中、后期起就受到了挫折，至“文革”时期更全面逆转。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局面才逐渐改变。而像我这样于1950年才开始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当然不可能不受到形势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种种缺陷和不

2 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足；视野的狭隘更是致命的弱点。因此，当我在那时读了日本学者在战后的若干论著以后，既多少了解了他们的汉学研究在那三十多年来的迅速的进步，开拓了眼界，也进一步看清了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左”的干扰下的问题所在。

也正因此，在日本时我就想回国后系统地翻译一批由日本学者撰写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著，以作为中国同行的“他山之石”。然而，人事促迫，岁月不居，仅在八十年代前期零星地译了几篇论文，其他就一无所作；与几位当时的年轻朋友合译的吉川幸次郎博士的《中国诗史》，虽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本五千册也早就售罄，但一直未见重印。值得欣慰的是：当时同译此书的朋友中，好几位仍在坚持此项工作。例如，邵毅平先生翻译了小尾郊一博士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李庆先生翻译了内田道夫等先生的《中国小说世界》，骆玉明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合译了前野直彬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多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先后出版。这都是很值得一读的著作。现在由张兵等先生译的小野先生此书也将作为这丛书的一种而印行，这在我自然是深为高兴的事。

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的事了，有一次张兵先生到我家来，看到了我书架上的此书，就借回去读。过了些时候，他告诉我，感到此书很有新意，想翻译出来。这也正是我在1979年10月初读此书时的感想。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因“左”的干扰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仍有学者对“三言”作了踏实的研究，许政扬先生的劳作是至今仍值得感谢的。但当我在1979年10月读到此书时，却还没有见到大陆学者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三言”的。所以，对于张

兵先生的想法,我很能理解;而且,他自己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话本——的,由他来主持翻译,当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如今此书的译本终于得以问世,但距离我的初读此书却已十八年了,我也已由中年进到了老年。想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连多译些日本同行的论著的愿望都未能实现,只能欢喜赞叹于别人的工作,实在不胜感慨与惭愧。但转念一想,既有别人的工作可以欢喜赞叹,无论如何总是值得欣慰的事,也就不必多作烦恼了。因此乐为之序,加以推荐。

章培恒

1997年9月于复旦大学

中文版序

小野四平

能有机会为我的著作中文版作序，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收录了我从1960年起至1970年止所写的十篇论文（《关于神仙说话》一文虽然是在1977年发表的，但原稿是于1970年完成的），这正好是我从二十七岁起至三十七岁时所研究的内容。为了写这篇序文，我再次重读此书，竟然有一种相隔半世纪以上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是在和很久以前的自己重新见面。我突然发现在论文中存在着很多由于年轻还不够成熟的观点，同时，在各篇论文中也深深地印刻着年轻人的积极热情的痕迹。

我的幼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前半段，正好是那场十五年的战争。少年时期的后半段，是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因为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少年时期的思想观念也非常零乱。然而，在这些零乱无序的想法中，我开始思考“日本究竟是什么”的命题，接着，在寻求解答中，我发现首先必须知道有关中国的知识。这是我在读了由竹内好先生翻译的鲁迅的作品以后开始深刻体会到的，于是我选择了东北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完成了题为《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的毕业论文。时值1956年3月。

2 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此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战败后的混乱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开始展开新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里,也开始逐渐恢复活力。我们注视着中国的研究进展情况,倾听着从大海对面传过来的信息。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有关中国的研究。在此后的十五年中,我主要的研究课题是以冯梦龙的“三言”为核心的明代短篇白话小说。这本书就是我所研究的一些成果。

从这本书出版后,我从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研究的领域开始转向唐代散文的研究,一直至今。虽然如此,但我也知道在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研究领域里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是在日本和中国,在美国、法国,还有荷兰,年轻的研究者不断地发表最新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以前的研究成果究竟能得到怎样的评价,连我自己也心中无数。但不管怎样,我想本书会给中国的研究者以新的启发。而且,我也希望能和素不相识的中国研究者进行崭新的交流和对话。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翻译者、复旦大学的张兵先生等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出版此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序文,评论社(东京)的竹下晴信社长对本书中文版的刊行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和理解。对上述两位先生我也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6年5月5日于仙台

目 录

序	章培恒 1
中文版序	小野四平 1
序章 短篇白话小说的产生	1
前言	1
城市文化的发展	4
明代的知识分子	6
明代的小说观	10
附: 中国对短篇白话小说的研究	13
第一章 关于冯梦龙	18
第二章 短篇白话小说中的判案	37
第三章 短篇白话小说中的恋爱	82
第四章 佛教“说话”研究	130
一、酆都冥府的形成	130
二、济颠“说话”的形成	159
三、《明悟禅师赶五戒》论	181
第五章 道教“说话”研究	206
一、关于神仙“说话”	206

2 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

二、关于吕洞宾传说	228
三、关于道情	248
后记	266
译后记	271

序 章

短篇白话小说的产生

前 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的开头写道：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疑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宋代民间产生的“白话小说”，跟当时采用民间俗语写成的文章特点是吻合的。可以说，如果跟六朝志怪小说或唐代传奇小说相比的话，白话小说更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生活和情绪。这些小说，迎合了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中世纪市民阶层的趣味，它们在元、明间趋向成熟，不久到了明代，就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时，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所谓“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一批白话小说，结出了中国小说史上最丰硕的成果。

白话短篇小说虽然由于有了四大奇书而被人们长期忘

却,但是,在明代也是一个产生丰富成果的时期,我们直到今天才知道的“三言”就是这样的作品。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谈到这些短篇白话小说。这里再引用开头的部分:

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叠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诂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

此等书之繁富者,最先有《全像古今小说》四十卷……

《中国小说史略》是1924年刊行的,稍晚一点有盐谷温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1926),接下去有长泽规矩也的《关于“三言二拍”》(1928),分别发表在《斯文》杂志上。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就这样经历了三百年,重又被人们从遗忘的深渊中发现,再次受到世人的瞩目。从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它的研究重新得以发展,旧貌为之焕然一新。

所谓“三言”,就是指明末冯梦龙(1574—1645)编的《古今小说》(又叫《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三部各由四十篇短篇集成的白话短篇小说选集。继续冯梦龙的工作,促进这类书籍的刊行,最知名的就是凌濛初(1580—1644)编集的初刻与二刻《拍案惊奇》(也各收四十篇作品)。以上统称“三言二拍”。从“三言二拍”中又精选出四十篇,编成了《今古奇观》。由于它单独流行,“三言二拍”反被人们忘却了。再

次引起世人注目,是在本世纪初,而且是经我国人的手介绍出去的,应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三言”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很深,因此我国研究者也特别热衷于对它进行研讨。

宽保三年(1743)至宝历八年(1758)间岡白驹、泽重渊等人刊行的《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共收十四篇)等作品,就是中国“三言”与“二拍”的翻译注释本。此后,西田维则的《通俗赤绳奇缘》(宝历十一年,1761)、石川雅望的《通俗醒世恒言》(宽政六年,1789)、江东月池睡云庵主的《通俗绣像新裁绮史》(宽政十一年,1799)等,也都翻译刊行了中国近代短篇白话小说。与此同时,各种出色的改编本出现了。它们在我国江户时期的大学中所放出的异彩,是不可忽视的。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的小说,就是其代表。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本土久已失传的“三言二拍”原书,被我国的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等人发现了。以此为契机,日中两国的研究者开始着手原本的发掘和介绍,并且开始进行各种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第二次大战前的中国,有郑振铎校订的“三言”刻印出版(活字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也都有排印本问世。这些,对学术界都有裨益。在我国,从佐藤春夫等尝试翻译《今古奇观》(收于《支那文学大观》,大正十五年,1926)开始,到青木正儿校注复刻《通俗古今奇观》(昭和七年,1932),直至村松暎的《杭绮州谭》、入矢义高的《雨窗欹枕集》与《洛阳三怪记》、吉川幸次郎的《西山一窟记》、鱼返善雄的《中国一千零一夜》等优秀现代语译本问世。昭和三十三年(1958),千田九一等人的《今古奇观》(《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平凡社)全译本公开

发行。当时，辛岛骁(东洋文化协会)曾计划翻译全部“三言二拍”，可惜中途夭折了。

由此可见，对短篇白话小说的研究，正渐渐兴盛起来。

追随诸位前辈学者，我在一段时间里，曾专门以“三言”为研究对象，尝试进行若干调查考察。本书作为研究成果，包括了我调查所得的大部分情况。我之所以要在接触本书的正式论述之前，约略地记述有关短篇白话小说产生的情况，是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本论。以下文章较多采用了日中两国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叙述的繁琐，对各种观点不再一一注明，只列出主要参考文献。至于文章的全部责任，当然由我本人来负。

城市文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明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白话小说空前繁荣的时期。我们先考察一下形成这一繁荣的背景吧。

中国社会经历明初的繁荣之后不久，就遭遇到重大的社会危机。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高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再加上苛捐杂税，造成农村社会的极度贫困化，它的结果是流民的大批增加，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危机的表征。但是十六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再次出现相对的稳定，而且开始走向繁荣，特别是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徽州、宁国、扬州、广德等地的纺织业，出现了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盛况。由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城市经济的发展，其中特别是苏州更为引人注目。与其把苏州称为单纯的商业城市，倒不如说它已具备了轻工

业城市的某些显著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这可以在称为“机户”的资本占有者和出卖劳力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中得到确认。此外，冶铁、采煤以及瓷器制造业等手工业的发展规模，都已经超过了明初。特别要指出的是，印刷业有着更为惊人的发展。十五世纪中叶，江南的无锡、苏州等地的铜版印书业已经盛行，但是不久，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江南丹徒县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以南京为中心，群众印刷文化开始流行起来。与此密切联系，小说、戏曲类的印刷业开始盛行。闽（福建）、荆楚（湖南、湖北）一带的造纸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印刷文化，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伴随着工商业的扩大和城市的发展，引人注目的必然是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可以想象，农村经济的破坏，必然导致流民的增加。他们脱离农村中各式各样的封建关系而流入城市，其中多数人成了城市中生产及消费劳动的劳务提供者、零星商人之类的中下层市民。另一方面，那些退休的高级官僚、大地主中的豪富，都竞相移往城市，享受消费文化。随着王室绝对权力的摇摇欲坠，明末城市中的多数市民，从行将崩溃的王室权威压抑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形成了独立的城市文化。

由于宋朝商业经济的扩大，促使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等大城市的发展，在这些城市中，由于一般市民的要求，代表这个时代的新的娱乐形式如戏曲、评话等平民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发展。诸如此类的情况，经过元代，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在元代，可以称为平民文化代表作的“杂剧”流行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些戏曲的脚本流传到今天，就称为“元曲”。明代继承了元曲的传统，产生了称为明代“传奇”的长篇文学剧

本。一方面,宋以来的传统“说书”及其蓝本——“话本”,到明代更加广泛地流行起来。这些都是城市繁华地区色彩缤纷的市民娱乐生活的产物。在这些地区,一些“说书先生”的语言技巧已显得十分洗炼,反映了那个时代市民的趣味。当时,由于印刷文化的发展和读书人口的增加,导致了从“听书取乐”到“以自己阅读为乐”的转变,于是慢慢出现了优秀小说的定型。从当期刊完的短篇到可以称做雄篇大作的巨制,此时纷纷登场。作为这个时代文艺界最具代表性文学体裁的小说,就这样开始崛起。

可是,在小说发展的背后,我们不能忘却统治者一再颁布的各种严厉禁令。从元代到明代的各种资料表明,当时的青年脱离生产,奔向城市,热衷于弹词、评话、戏曲的情形极为普遍。当局对此发出了禁令,甚至还将“说书家”们判以徒刑。但作为城市中下层市民为核心的民众自我表现形式——大众文艺,就这样在反抗压迫中顽强地滋长起来了。这个时代的小说具有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跟民众对权力的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

不用说,支撑着各式各样新兴城市文化的,是当时活跃的知识阶层。下面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们的形象吧。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正是在小说中找到了自我表现的地方。

明代的知识分子

在宋朝,天子独裁的新的官僚统治制度替代了旧的门阀统治机构。这个政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宋代是中国政治史

上特别重要的时期。宋代的官僚阶层，都由经科举考试合格的知识分子组成。科举制度不问是否门阀贵族家庭出身，实行对所有人都门户开放的政策。在科举中录用的人才，被授予进士的称号，赋予一般平民所没有的各种特权，不久还有被作为官吏授以一定职位的资格。他们被称作士大夫、士人或者读书人，被公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并在政治上成为面对民众、辅佐天子专制制度的新的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就像贵族制度下的贵族文化曾经是这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一样，代表宋代文化的是在新的官僚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士大夫官僚文化。

可是到了元代，汉民族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呻吟，特别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受难的时期。进入官僚统治阶层的道路变得不平坦了。留给他们的，是历来由平民从事的官厅杂役之类的屈辱性工作，要么只能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屈辱，逃离政界，隐居起来。在这群隐居者中，不久就产生了艺术至上的文人集团，形成他们独特的文化。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元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是特别不幸的一百年。

经历了元代风暴的知识分子，再次迎来了汉民族自立的明代，但是幸福依然没有降临。科举制度给他们打开了一条与民众隔绝的被赋予特权的仕途，可是，这时期可以说，早在宋代作为一般士大夫官僚都具有的自尊心，他们已经消失殆尽了。明太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不能保证他们良心的自由，相反，他们受到专制制度更严重的压抑。由于确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确立了新的科举制度，这个时代的多数士大夫官僚，事实上已成为天子独裁政权的忠实而有力的工具，不久，这些弊病也就被掩盖起来了。清初的著名学者顾

炎武(1613—1682)严厉批判了这种情形,竭力主张废除生员制,开始政治改革,让社会上各种有用人才涌现出来。

跟明朝围绕宫廷的知识分子——头脑僵化的士大夫官僚的情况不同,不久就出现了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在野知识分子。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重任,实际上是由他们担当起来的。

当时在中国,有一批私塾或者叫书院,有值得自豪的社会地位,可以叫做私立大学。以此为基地,他们形成了“阳明学派”,特别是其中受激进学风影响的王学左派,成了在野知识分子的典型。书院不光为知识分子,也为研究学问的一般民众提供了自由讨论和研究学术的场所。王心斋(1483—1540)和李卓吾(1527—1602)等人的思想行为,对寄托于旧的权威的士大夫来说,是个强烈的冲击。李卓吾把人类内在的本性称为“童心”,由于这个“童心”,他主张一切人都是有尊严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个观点对传统儒教的权威是个根本否定。这个包含近代思想的观点立刻招致统治者的憎恶,他被投进监狱而死。但是他点燃了的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的火焰,终于顶住了种种压力,直到清初,还在知识分子的胸中燃烧。特别应该提一下,对于一直被知识分子认为不屑一读的小说——比如《水浒传》,李卓吾却认为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跟书院出身的人不同,作为一面批判当代社会、一面创造自由文化而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受到瞩目的,是那些被称为“隐士”的人。从明代初期开始,在苏州、松江等南方大城市里,以经济繁荣为基础的对北方中央文化的批判精神逐渐发扬光大。隐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支自由人的队伍,沈周(1427—1509)、祝允明(1461—1527)、唐寅(1470—1523)、文征明(1470—1559)、徐祯卿(1479—1511)等人可以